

“学习时间不办公”背离公共服务方向

■杨朝清

日前,广西南宁市民黄女士为给住院的老母亲办理医保手续,下午三点一上班,她就急匆匆地来到南宁社保局。没想到,大门紧锁,门前赫然贴着一张告示,上面写道:周二和周五的下午是处理数据、业务学习时间。“学习时间不办公”,这让不了解情况的群众,屡屡吃到“闭门羹”。(11月11日中国广播网)

作为一种制度化手段,公共部门开展理论、业务学习有其必要性。然而,当“学习时间”成为“不办公”的挡箭牌,显然背离了公共服务便民、利民的基本属性。一件原本轻而易举的

事情,却让老百姓有了“伤不起”的无奈和艰辛;每一次“闭门羹”,都会在无形之中增添老百姓与公共部门的距离感与隔阂感。

“学习时间不办公”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时间冲突,导致工作人员分身乏术;从本质上看则是一种偏离群众路线的官僚主义——对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失去了敏感性的反应能力,当公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推诿卸责。这种做法,既违背了专业主义和职业伦理,也背离了老百姓的期许。

破除官僚主义带来的距离感与隔阂感,迫切需要重新回答“为了谁、依靠谁、我是谁”的时代之问。密切联系群众、转变工作作风的背

后,是发展观念的端正、是价值排序的重塑与人文关怀的重振。换言之,“学习时间不办公”不仅是制度问题和程序问题,更是一个认识问题和作风问题。

从实施操作上讲,“学习时间不办公”将学习与办公看成对立、排斥的关系,却忽视了二者的兼容性与互补性。不论是将内部学习安排在上班前或者下班后,还是将内部学习安排在周末,抑或是实行分层学习,安排一部分人在办公时间内部学习,另一部分人对外办公,“边学习边办公”,方便老百姓办事;只要设置合理,学习时间同样可以办公。

“学习时间不办公”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

传统,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“潜规则”。然而,伴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,老百姓对公共服务有了更为强烈的利益诉求。如果公共部门依然在陈词滥调中打转,依然在批评质疑中自说自话,就难以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信任。

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,显然离不开公共服务的优化和升级。眼睛向下看,倾听老百姓“沉没的声音”,回应公众诉求,公共部门要更加注重受众的切身感受,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益,逐渐实现公共服务标准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的转变。从这个角度上说,“学习时间不办公”需要纠偏与改进。

一日女友

■小正/文 春鸣/图

“陪吃陪逛每小时5元,陪看电影每小时10元”。“光棍节”前夕,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男生宿舍楼下的一则广告引来围观,女生将自己明码标价“出租”。该女生表示,“我想以这种特别的方式,在光棍节体验一天有男友的生活”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租女友或男友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举动。最常见的,应该是过年过节为了应对父母和家人催婚,一些单身男女租个女友或男友回家。一般来说,无论是主动出租自己还是出钱租赁别人,除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外,双方多多少少都有点寻找小刺激、体验一般经历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。作为一种特殊的租约,倘若双方都能严格按照事先的约定办事,你情我愿,无可厚非。但是,有刺激往往就有风险——对女方来说,谁敢保证自己不会遇上“披着羊皮的狼”?而对男方而言,遇上女骗子也不出奇。

女大学生出租自己,在“光棍节”当别人的“一日女友”,算不上什么新创意,也容易引起别人的灰色联想,似乎不值得提倡。要真想体验有男友的生活,还不如认真真谈一次恋爱。



信访须走出“所有矛盾自己扛”的制度困境

■张若渔

中国信访制度正进行重大变革。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、通报,有关部门确立了“把矛盾化解在当地”的新思路。一场以取消信访排名为标志的信访改革,正在悄然推进,其影响程度,不亚于劳教制度的废除。

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,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升迁直接挂钩,而对地方信访造成巨大压力。地方官员千方百计减少“非正常上访”人次数,甚至不惜采取粗暴手段进行“截访”。同时,受到厚黑利益刺激,一个暗流汹涌的“截访市场”逐渐形成并蔚为壮大,“黑保安”、“黑监狱”不时被曝光,显示地方信访工作在悖理法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,目前中国地方信访呈现极不正常的状态。“截访”作为一种非法却常规的工作方式,不仅无助于社会矛盾的纾解,反而是使矛盾进一步升级和复杂化的导火索。事实上,地方政府对此有着深入骨髓的认识,但截访的行政惯性俨然尾大不掉,面对“非正常上访”事件,左支右绌而又疲于应对的地方政府,根本没有从容的心境致力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。一种简单粗暴、投机功利、只求暂时立竿见影的“截访观”,深深左右着地方政府的信访工作模式。

取消信访排名,解除排名与官员升迁的对应关系,毫无疑问是中央在痛定思痛之后作出的明智决策。时至今日,中国信访制度,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,理当有一个大的制度转向。取消信访排名,在制度上为地方信访松绑,给各地一个相对从容的环境,去致力于从源头和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。从此之后,对官员的信访考核,不再是“上访”多与少的问题,而是“矛盾”解决多与少的问题。有了这样的政绩指挥棒,官员们就不会再绞尽脑汁截访,而是苦心孤诣解决实际问题。

信访制度改革不仅要解放官员,关键还要解放信访制度自身。现在的局面是,信访领域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集大成者。所有复杂难解的矛盾和问题,都倾向于流向信访领域。这实在是信访不可承受之重。信访只是、也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、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一个渠道,而且在社会治理结构中,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渠道,但现在却成了主要渠道之一。

“把矛盾解决在当地”,不要轻易让矛盾产生并流向信访,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,涉及行政、司法与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。行政是第一道关口,解决矛盾的首席责任方,社会矛盾是渐渐消弭还是日渐坐大,完全仰赖于行政解决机制的有效性;其次是司法渠道,法院等机构应担负起正义供给者的角色,以法律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;此外,上访者单位以及其他社会性组织的安抚、调停和粘合角色亦不可小觑。建立起三道解决矛盾的关口,除非到万不得已,绝不把社会矛盾漫溢到信访领域。

别把单身都想得那么悲情

■乔杉

世上其实只有两种人,一种是光棍,一种不是光棍。又是一年双11,我国将近1.8亿的单身人群持续成为公众目光的焦点。近日,百合网发布的“中国光棍盛产地排行榜”显示,广东光棍总数居全国之首,男光棍数量亦为全国最多。而在广东省,光棍总量位列前三的城市分别是广州、深圳、东莞。

看到这一调查,有人可能诧异,广东不是发达省份嘛,怎么光棍总数全国最多?广州、深圳、东莞不是发达城市嘛,怎么光棍总数在广东名列三甲?不可思议的背后,其实有着必然,而这也涉及社会如何看待和认识光棍。

在传统观念里,光棍是一群很悲催的人,他们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,向往两个人的幸福。但如今的事实并非如此,起码不是普遍如此。近些年来,“光棍节”从民间快速兴起,越来越

充满乐观和自我解嘲。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中,那些大叫自己光棍的人,有几个不是带着一种调侃,甚至带着一种土豪式的炫耀?又有几个是真正的那么悲情呢?

这里对应着一个多元的时代,一个进步的时代。现在的光棍,已经不是狭义的失败者,甚至他们不是没有机会,而是机会过剩。看过杨澜主持的一档节目,嘉宾称,步入婚姻殿堂并非唯一的选择,“如果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真爱,保持单身有什么错吗?相比承受一次失败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,这或许是更好的选择”。这里传递出的一个事实是,虽然有许多人没有机会“脱光”,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,更多是不愿意“脱光”——他们有的是单身主义者,有的为了事业而没有顾得上婚姻,有的为了最完美的爱情而在默默等待。

可能很少有人想到,城市和单身之间的关系,存在着逆向性。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·格莱泽在畅销书《城市的胜利》中曾经写道:城市是努力工作和学习的地方,人口密集的城市吸引着更为年轻的单身人士,而且越是发达的城市,单身人口可能越多。由此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广东光棍总数居全国之首,为什么广州、深圳、东莞光棍总数位居广东前列。

有结婚的权利,也有不结婚的权利;有没有机会的单身,也有机会多多的单身;有实力不够的单身,也有实力大大的单身。这便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状况。因此,千万别把单身想得那么悲情那么不堪。我们更应该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,以及不同的婚姻家庭观念。

广告